

90年代中国经济面临的双重结构矛盾及其出路

●周振华 —

在治理整顿中进入90年代的中国经济，将面临双重结构矛盾，即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和生产过程中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的结构矛盾。如果这双重结构矛盾得不到缓解，90年代中国经济的前景不容乐观，甚至会影响我国经济顺利进入21世纪。本文针对上述结构矛盾中一些尚存争议的问题谈谈笔者的认识，以供参考。

一、双重结构矛盾的历史变迁

在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后期）经济高速增长中，一个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是基础产业难以支持加工产业的迅速发展，形成生产中的瓶颈制约。正是在这种结构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开始了经济紧缩的治理整顿。在这一治理整顿过程中，由于加工产业生产收缩，以及基础产业的倾斜发展，两者之间的结构矛盾得以缓和，但在市场疲软的影响下，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却日益激化起来。当时有不少人认为，这一矛盾激化只是紧缩政策效应的反映，是紧缩政策下消费不足的结果，似乎只要放松紧缩政策，刺激消费，就可以解决库存积压。但随着宏观政策转向，放松贷款，降低存款利率，经济逐步回升，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性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日趋严重，库存积压大量增加。这一情况表明，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并非紧缩政策所致，它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事实上，即使在80年代国内消费品市场急剧扩张，不少消费品（尤其是新兴耐用消费品）供不应求、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产品不适销对路，库存积压。只不过在当时消费热潮诱发和通货膨胀冲击下，人们具有较强烈的消费冲动和盲目抢购心理，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掩饰了这一矛盾。而且，当时基础产业不适应加工产业超前发展的严重瓶颈制约，成为整个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性矛盾。但是，正是在8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隐伏下了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并使这一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结构矛盾。

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性矛盾，从本质上讲，是供给结构缺乏弹性，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动的问题。只要供给结构不能及时地通过增量调整和存量转移，有效地进行资源重组，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在所难免。从这一意义上讲，传统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从本质上就规定了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性矛盾是其基本属性之一。那么，这一结构性矛盾为什么到80年代后期才日益明显化呢？

8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三个显著变化：（1）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对传统行政机制的冲击，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系统之中，市场需求对生产的拉动和制约作用不断强化，生产适应需求变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2）随着供给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强，买方市场开始向卖方市场转变，消费者主权日益扩大。（3）随着以必需品为主的消费阶段向以非必

需品为主的消费阶段的转变，消费的选择弹性和替代弹性大大增强，消费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特色化。这三方面的显著变化构成了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的显示条件，使原先机制性的供给结构僵化所产生的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如果说上述三方面的显著变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产物，那么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激化，则是新旧体制转换中内生摩擦的必然反映。从这一意义上讲，治理整顿的紧缩政策只是提供了一种契机，使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突然显示出来。实际上，即使在1988年底不采取紧缩政策，这种结构性矛盾也将逐步显示出来，只不过没有如此之大的反差而已。为了启动市场，我们扩大了信贷规模，放松了对集团消费的控制，降低了存款利率，削价处理库存产品，并向经济系统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市场迟迟难以启动，似乎市场疲软的惯性很大。目前经济虽然全面回升了，但消费需求回升明显滞后于生产速度回升，而且在消费需求回升中，主要是集团消费回升迅速，居民消费平稳。因此，产值增加，库存增多，效益下降，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目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结构矛盾有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经过治理整顿，但加工工业过度的生产能力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近一时期资金的大量投放，将会使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的结构性矛盾重新激化起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所遇到的结构性矛盾，是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矛盾，在消费需求不旺的情况下，加工产业过剩生产能力对基础产业的需求就膨胀不起来，因而主要问题是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性矛盾。笔者认为，这两个结构性矛盾在80年代是同时存在着的，在90年代也许还是如此，但在80年代以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的结构矛盾居主导地位，而在90年代则可能由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居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90年代经济发展中，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也许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的结构性矛盾得以缓解了。受消费需求制约，加工产业过剩生产能力对基础产业的需求收缩，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国生产中的高物耗状况将始终对基础产业形成强大的压力。过去人们通常把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加工产业超前发展，或基础产业滞后发展。实际上，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加工产业对能源、原材料的高消耗上。在这种高物耗情况下，即使加工产业按照正常增长率发展，基础产业的生产能力也将大大扩张。且不论基础产业建设周期长，需要大量投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瓶颈制约状态。就算其生产能力能迅速扩张，这也是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所要求的基础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向背道而驰的。

虽然经过治理整顿，加工产业盲目扩张受到抑制，基础产业得到倾斜发展，但高物耗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从而对基础产业的强大压力依然存在。而且，目前加工产业生产扩张虽受到消费需求不振的约束，但其庞大的生产能力因缺乏有效的存量转移机制并没有得以相应收缩，而是以闲置的形式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刺激中间需求，加工产业过剩生产能力对基础产业的需求仍会膨胀起来，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仍可能发生。

总之，这双重结构矛盾虽然从80年代到90年代已发生历史变迁，但原有的基础产业瓶颈制约的结构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而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却日益突出。

二、双重结构矛盾下的经济态势

上面的分析表明，90年代中国经济将面临双重结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与消费错

位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在这双重结构矛盾困扰下，国民经济运行将呈现一种怎么样的态势呢？

目前人们对经济回升是否会出现过热有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认为，由于前两年为启动市场投放了大量贷款，货币超量发行，以及考虑到近年来职工收入增长过快等背景，当前经济回升很可能走向经济过热。另一种判断是，现在的消费发生了很大变化，80年代那种拉动生产急剧扩张的消费品需求超常增长势头已不复存在，新一轮消费热点尚未出现，这种没有消费积极接应的生产，即使有大量资金投放也难以热起来。

笔者认为，在生产完全受市场需求约束的情况下，生产与消费错位所导致的消费需求不振，将直接影响投资需求和中间需求，最终制约经济扩张。从这一角度来看，不仅当前经济回升不会走向过热，而且整个90年代经济都将低速增长。如果说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的结构矛盾的激化（在物耗水平既定情况下），是经济过热的结果，那么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的激化，则是经济低速增长的原因。也就是，基础产业瓶颈制约的矛盾总是伴随着经济过热，而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矛盾总是伴随着经济低速增长。而且，在第一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其矛盾程度也不严重，否则就不会有强劲的需求拉力导致经济过热。在第二种情况下，即使存在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的结构矛盾，也会趋于缓解，因为受消费需求不足的制约，加工产业生产能力不会对基础产业产生膨胀的需求。

然而，在目前情况下，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激化对经济扩张的抑制，其假定前提条件并不存在，即生产并不完全受市场需求的约束。这是因为在目前双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尚未完全推入到市场中去受市场的检验和选择，生产仍有可能游离市场的约束。当然，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强化的今天，生产完全不受市场约束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经过修改的前提条件下，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虽然对经济扩张有抑制作用，但并不一定与低速增长相联系。因为在消费需求不振的情况下，仍有可能通过行政干预下的大量资金注入来扩张投资需求和中间需求，进而拉动生产高增长势头。

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起因的经济过热。一种是由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过热，如80年代的几次经济过热概属于此，这种经济过热的形成链大致是：在消费需求超常增长的拉动下，加工产业具有迅速发展的较大潜力，诱发加工产业投资需求膨胀和中间需求扩张，然后通过产业关联引发整个经济扩张。另一种经济过热则可能是由投资需求膨胀和中间需求扩张推动的，即在消费需求不振情况下，通过对经济系统（生产和流通环节）注入大量资金，诱发投资需求膨胀和中间需求扩张，然后在产业关联传导下引发整个经济扩张。这两种不同起因的经济过热，虽然都具有产值速度超常增长，货币超经济发行，基础产业瓶颈制约等基本特征，但其性质是不同的。前一种经济过热往往是速度效益型的，速度上去了，效益也随之上去了，并伴随着显性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后一种经济过热则是速度非效益型的，即速度上去了，效益并不随之上升，甚至下降。因为高速增长的产值中有相当一部分形成库存积压，从而导致大量产成品资金占用，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放慢，企业间互相拖欠严重，企业亏损加剧，财政收入减少，赤字扩大，金融风险增加等问题。并且，它伴随着隐性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

从目前的经济回升情况来看，虽然生产速度增长较快，但剔除基数偏低的因素影响，速度仍为适中，至少目前还不能得出经济过热的判断。然而，值得警惕的是，消费需求回升并没有对生产形成足够的拉力，经济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需求和中间需求扩张支撑的，因而目前已经显露了第二种经济过热的许多症状。如果这种状况继续维持下去，那么很可能会

出现消费需求不振情况下的经济过热。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不改善双重结构矛盾，尤其是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那么90年代中国经济态势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态势是：在消费需求不振约束下，经济中、低速增长，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的结构矛盾不会很突出。另一种可能态势是，在消费需求不振不完全约束下，通过人为扩张投资需求和中间需求拉动经济高增长，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的结构矛盾由此可能激化。但这种高增长势头不会持续，主要是受双重结构矛盾的制约所致。一方面难以实现其价值的产品积压，会引伸出一系列问题，最终将遏制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基础产业难以支撑高物耗水平的经济扩张，也将制约增长速度。显然，维持经济低速增长，也许是我们不愿意的事情，更大的偏好可能是推动高增长，但这种高增长势头又难以持续，因此90年代中国经济将呈现低增长→高增长→低增长的波动态势。

这种波动态势从形式上看似乎与80年代经济增长轨迹类似，但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具体讲：（1）在波动过程中，高增长势头不足，且持续时间短暂。80年代的高增长主要受消费需求的强劲拉动，增长势头凶猛，而且它只有在基础产业生产能力过度使用时才受到制约，持续时间较长。与此不同，在消费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高增长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的，这不仅关系到外部力量的大小，而且涉及到外部力量进入经济系统的顺利程度。即使政府能动员起足够的力量启动经济，这种外部力量进入经济系统也将处处渗漏，例如大量注入资金在三角债连环套中沉淀下来。因此，很难形成高增长的强大势头。一旦形成高增长，也会受双重结构矛盾制约，较快地变速。（2）在波动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低效益。80年代的增长波动与效益波动几乎是同步的，低增长，低效益；高增长，高效益，因而在波动过程中，总还出现过高效益的时候。与此不同。在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制约下，不仅低增长伴随着低效益，而且高增长也只能是低效益，成为一种低效益下的增长波动。（3）在波动过程中，结构低水平调整。80年代增长波动伴随着产业结构高度化转换，几轮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高增长，使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涌现出一大批新兴耐用消费品产业。与此不同。在消费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增长波动虽然也伴随着产业结构变动，但主要是在原有层次上的结构调整，难以引发新兴产业的出现。

因此，如果不解决双重结构矛盾，特别是居主导地位的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90年代中国经济态势将是十分险恶的，远远不能与80年代相比。我们必须预见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不能沉湎于市场疲软之后，经济会全面回升的盲目乐观之中。

三、解决双重结构矛盾的基本对策

显然，90年代中国经济态势，不论是持续低速增长，还是低效益的波动增长，都不是我们所期望出现的现象。我们所要实现的是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非解决双重结构矛盾不可。笔者认为，解决双重结构矛盾，尤其是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将是我国90年代经济工作中的重点。

一般来说，解决结构矛盾需要采取相应的产业结构政策，诸如限制或禁止某些滞销产品的生产，鼓励和扶植某些适销产品的生产，并对某些产业实行倾斜发展等。这一工作前几年我们就已经在做了，但似乎没有很显著的成效。笔者认为，我国产业政策成效不大的原因，除了产业政策本身的政策缺陷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结构矛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失衡，而具有特殊性质。它在更大程度上带有一定体制和发展模

式下的刚性扭曲的性质，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和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对这样一种性质的结构矛盾，单纯依靠产业政策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因此，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双重结构矛盾，必须触及其根深蒂固的基础和理顺其各种关系，进行体制变革和发展战略调整。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双重结构矛盾所具有的刚性扭曲的性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供给结构缺乏弹性，难以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2）消费需求结构畸形变动，难以对供给结构作出正确的引导；（3）技术结构落后，难以在供求关系中起自动调节作用。这三方面的问题涉及深层次的体制和发展战略，是传统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弊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而解决双重结构矛盾必须在这三方面有较大的改善。

（一）增强供给结构弹性。

供给结构弹性是指产品供给适应于需求结构变化的反应程度。这种反应程度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表层反应和深层反应。所谓表层反应是指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产出变动是在潜在产业生产能力结构不变情况下，由中间要素投入结构变动引起的反应。所谓深层反应是指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产出变动是由潜在产业生产能力结构与中间要素投入结构变动共同引起的反应。从严格意义上讲，供给结构弹性是指对需求结构变化的深层反应。我国供给结构缺乏弹性，也主要是指缺乏那种深层反应，即潜在产业生产能力结构刚性。这种结构刚性集中反映在：面对需求结构的变化，应该扩张的产业生产能力不能迅速扩张；应该收缩的产业生产能力无法有效收缩。在这种情况下，供给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中间要素投入结构变动来实现的，但这将引起实际产业生产能力结构与潜在产业生产能力结构的偏差，使一部分生产能力过度利用，一部分生产能力闲置。不仅如此。在缺乏兼并和破产机制的情况下，为维持不景气企业的生存，连中间要素投入结构调整也无法到位，从而滞销产品仍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因此，不解决潜在产业生产能力结构调整问题，单靠中间要素投入结构调整，是不能解决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矛盾的。

假定技术结构不变，那么潜在产业生产能力结构实际上就是产业固定资产结构。产业固定资产结构调整，一是增量调整；二是存量调整。我们过去主要采取增量调整，而且主要是行政性的增量调整。实践证明，这种调整方式对增强供给结构弹性作用有限，而且常常带有较大的失误，增强供给结构弹性，必须要把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结合起来，并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

增量调整要采取政府倾斜投资与企业自主风险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政府倾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性的短线部门（如交通和通讯）和未来主导产业部门。其他部门应以企业自主风险投资为主，政府辅助于引导和协调。也就是，政府广泛收集信息，分析市场形势，发布投资指南，积极引导投资方向和总体协调投资项目。企业则作为投资主体，根据市场的变化和要求，自主决定投资项目，承担投资风险。

存量调整要在界定明确产权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公平竞争实行兼并重组。政府除了对少数行业实行行政性的关、停、并、转外，主要精力放在重新评估国有企业资产，建立符合商品经济的产权制度，清除企业兼并、联合的种种障碍，全面推动企业之间跨地区、跨部门、超越所有制差异的兼并和联合，逐步形成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和综合商社。

（二）完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

目前消费需求不振，从农村来讲，主要是受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迟缓的影响，表现为购买力不足，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则不存在购买力不足问题，主要是缺乏新的消费热点。缺

乏新的消费热点，固然与供给有关，但不完全是供给的问题。实际上，有些新一轮消费品的供给已不成问题，但由于缺乏消费的配套条件，使这些消费需求难以形成热点。对于农村市场来说，从长期来看，即使改变了目前购买力不足的局面，也将面临这一问题。80年代后期的新兴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等）在农村的普及率并不高，而这些产品的供给能力很大，但它在农村的普及却会受到消费条件的限制。这实质上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偏重于工业化，而忽视了城市化。因而，当以必需品消费为主转变为以非必需品消费为主，并不断向高层次的居住消费、劳务消费和精神消费拓展时，滞后的城市化就日益阻碍消费范围的扩大和消费层次的提高，造成了消费条件制约下的消费需求不振。当然，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消费需求结构，限制了居民消费范围。

因此，完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除了改革传统社会福利制度，拓宽居民消费范围外，主要是加速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战略产业。然而，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并不仅仅是增加城市建设投入的问题。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疏通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两者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从历史上看，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内在联系是以市场化为中介的。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割断，正是因为缺乏市场化这一中介。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通过市场的力量推动城市化建设。

在此前提下，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城市化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带有任其自然发展的倾向，导致了星罗棋布、自然分散的小城镇的发展。这种“村庄式的都市”的“城市”生活，不能使对新兴非必需品和第三产业的有效需求扩张多少，也不能发挥规模经济、聚集经济和乘数效应。笔者认为，比较合理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将农村工业化中涌现出来的乡镇工业有计划地集中到一批重点城镇中去，集中力量将其建成中等城市，使其成为联系周围农村小城镇与大城市的一个中间环节。这种以大大改善交通、增设商业网点、扩大公用事业、迅速提高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质量、修建更多住房为基础的中等城市的发展，将为居民有效需求的迅速扩张提供条件。对于原有的大城市，则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这样，就能大大改善居民的消费条件，保证消费需求结构的正常变化。

（三）提高技术结构性能。

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我们一般提技术进步问题。但从解决结构矛盾的要求出发，则是提高技术结构性能问题。技术结构是指不同类型技术（如劳动节约型技术、资金节约型技术等）和不同层次技术（如尖端技术、中等技术等）的比例关系。技术结构的性能在于调整与完善供求结构关系。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同一种产品，既可以用先进技术生产，也可以用中等技术生产；既可以用节约劳动的技术生产，也可以用节约资金的技术生产，只要能生产出同等数量的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就行了。技术结构的合理性，主要取决于它是否适应国民经济主要产品的供求关系的衔接。

我国总体技术水平是比较低的，需要大搞技术进步，但解决结构矛盾，则应更加注重提高技术结构性能。针对目前双重结构矛盾，技术进步的重点应放在开发新产品和降低物耗上。当然，原有产品的技术改造也是需要的，它可以降低成本，从而以价格下降来刺激需求，但其作用有限，难以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从根本上缓解生产与消费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技术进步的主攻方向要放在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新产品开发上，以新的技术不断推出新产品。除此之外，技术进步要以降低物耗为目标，提高中间投入的产出效率，以缓解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的结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技术结构对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